

考古区域系统调查的理论、实践与反思

赵 潮 (美国匹兹堡大学人类学系)

潘 臻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区域系统调查方法 (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 起源于西方考古学界，是服务于聚落考古，以研究古代社会为目的的系统性抽样调查方式。自 1990 年代至今，区域系统调查已在我国进行了一定范围的尝试，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与一些阶段性的认识。区域系统调查是在大时空尺度范围内探索社会复杂化进程、人地关系、文化交流等诸多问题的重要手段。限于该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其在研究不同层级的考古学问题上的可靠程度有所差别。鉴于中国考古遗存的特殊性，区域系统调查方法在某些地区的应用，应灵活配以钻探、剖面清理等多种方法，以保证调查结论的可靠性。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须严格坚持定量化、系统化的思路。

关键词：区域系统调查；聚落考古；社会形态；人地关系

一 定义的辨析：何为区域系统调查

为更好地理解区域系统调查的内涵，我们首先要对其进行明晰的定义界定。在中国，区域系统调查的方法，又被称之为“拉网式调查”、“全覆盖式调查”、“卷地毯式调查”等。然而，这些概念并未能揭示清楚区域系统调查的内涵。区域系统调查虽然理论上要求调查者将所定调查区域内的每一寸土地都进行踏查，然而毕竟有无法触及到的地点，同时在踏查之中也是以基于概率抽样式的搜索为主，因而全覆盖式调查与卷地毯式调查未免有“一个都不少的完美之嫌”，无法体现出区域系统调查方法中抽样性的特征。^[1]而“拉网式调查”之称，虽然能够较为准确地体现抽样性的特征，但该称呼仅仅是从技术角度阐述区域系统调查，无法全面反映其理论与方法层面的内涵。此外，当今中国考古学界还存在将区域调查与区域系统调查相混淆的状况。虽然，区域调查与区域系统调查都强调特定的区域范围，但

在方法论及指导思想上有重要区别。区域系统调查讲究对区域内的地方进行全面踏查，并系统性地以固定统一的标准搜集样品，从而确保在之后进行信息统计、分析时的系统性，因而具有逻辑缜密的一整套方案，尤其是基于概率统计学的定量分析。^[2]而区域调查则无此方面的含义。

二 区域系统调查方法的兴起、发展及其学术意义

(一) 区域系统调查方法的兴起与发展

区域系统调查方法在西方的产生与考古学发展转型密切相关。20 世纪 50 年代，一部分考古学家不满足于仅通过类型学分析的手段研究考古遗存分布时空框架的文化历史考古研究范式，强调要全面研究古代社会，把握人类行为的规律，研究文化变迁与发展的机制，从而促使了欧美新考古学 (过程考古学) 的兴起。^[3]研究旨趣的转型，继而推动了一系列理论、方法的变革。聚落考古，由于其在探讨古代社会组织、人地关系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成为新考古学所青睐的研究

方法。为达到更为全面地理解古代社会发展、变迁的信息，聚落考古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1. 单个聚落形态和内部结构的研究；2. 聚落分布和聚落之间关系的研究；3. 聚落形态历史演变的研究。^[4]

对于单个聚落形态与内部结构的研究，可以通过大面积揭露式发掘，重点抽样发掘配合钻探等方式来进行。然而对于聚落分布、聚落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聚落形态历史演变的研究，往往要涉及到一片区域内的众多聚落，仅依靠发掘的方式来完成，无疑是极为费时费力的。而调查的方式则能够确保在有限的人力、财力、时间的情况下尽可能全面地对一片广阔区域内的聚落分布状态进行把握，因此成为聚落考古宏观研究层面上不可或缺的方法手段。20世纪50年代，威利在秘鲁维鲁河谷的区域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开启了运用调查法研究聚落变化及社会变迁的新模式。^[5]然而，起初的调查方法，较为关注区域内重点地区的遗存分布，往往在信息的采集方面有较大疏漏，不能客观反映区域内聚落的分布信息。同时方法欠缺系统性，为之后的定量、比较分析带来了很大不便。在此基础上，西方考古学家对调查方法进行了改进，将系统性的地面踏查与遗物采集引入进调查之中，强调在调查之中对所圈定的地区，不分主次，一律进行地面踏查，并坚持贯彻标准统一的踏查方式与遗物采集、信息处理方式来完成调查，从而形成了区域系统调查这套较为完备，并且能更好地支持定量、统计研究分析的调查方式。^[6]对于提高聚落考古宏观层面研究上的客观性、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区域系统调查的学术意义

区域系统调查对于考古学研究的意义，首先在于其能够利用有限的人力，物力，时间，对一个选定区域内的聚落分布、变化的状态进行把握，从而获得大尺度范围内的古文化信息。为探讨社会变化（例如复杂化社会进程，社会组织形态），人地环境变迁等重大问题提供方法论层面的支持。^[7]

同时，区域系统调查一个重要的衍生价值在于其能够更加充分地发现以往调查研究中易被疏忽的遗址，从而弥补文物普查工作的不足之处。

而更多的遗址，无疑会提供更多的遗存信息，从而对于推动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问题也有积极意义。例如由于缺乏发掘材料，我们之前对于山东日照地区的商代文化面貌认识不清。而山东大学在日照地区进行的区域系统调查，发现了更多商代的陶片，并可看出其带有较为浓厚的岳石文化遗风，从而证实了之前认为该地商时期文化带有土著文化特性的推断。^[8]由此可见，区域系统调查，虽然以服务于新考古学对古代社会的研究为目的，但也对完善考古学文化谱系序列有着积极作用。另外，区域系统调查还便于确定遗址范围、规模，从而为之后制定更为优化的遗址发掘策略提供了信息。

三 区域系统调查方法的实际操作与具体运用

（一）调查前的准备工作

调查前的第一步便是对所调查区域的划定问题。区域系统调查通常是有着明确研究目的的调查方法，因此对于区域的划定与调查者的研究问题息息相关。例如，研究某一时期特定区域内的社会组织形态，我们往往以已知的大型遗址为中心，将其周边的一个范围区域划作调查区，从而根据遗址的空间分布与遗址类型，揭示研究该大型遗址在当时社会组织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不同聚落在社会组织网络中所处的地位与互动关系。^[9]并根据不同时期遗址分布的变化，讨论该大型遗址形成前后，社会组织形态方面有哪些承袭与转变，进而为探讨长时段尺度下社会的变迁、发展提供线索。

理论上讲，调查区域越大，搜集的资料越全面，也就越能准确反映遗址的分布与种类。然而，在实践操作环节，受人力、物力、时间所限，常常无法进行过大范围内的区域系统调查。因而，如何尽可能利用面积有限的调查区域来反映尽量完整客观的古代社会信息就成为了调查者在选定调查区域时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通常情况下，地形相对封闭的小型盆地、绿洲等是较为理想的调查区域，因为它们面积有限，同时受地理阻碍影响，一个小面积的优势资源斑块内的人群往往有更为密切的，自成一体的文化互动关系，从而在研究中，能够更多地排除



干扰性因素，更为清楚地看到一个特定人群的社会形态及其变化的轨迹。而在无封闭地理单元的情况下，调查者通常选择特定的河流附近沿线作为调查区。因为河流沿岸往往是人类聚落分布的重要区域。此外，一些特殊目的的研究，可能还会有不同的选择倾向。例如，美国匹兹堡大学人类学系博士丁山为研究中国北方地区青铜时代人类生存适应策略的转变，特意将调查区选定在辽河平原与科尔沁沙地的交汇区这样一个生态交错带，从而更便于探讨青铜时代该地区畜牧经济的发展，农与牧的生计转型等问题。^[10]

在对调查区域划定之后，我们便需要得到所要调查地区的大比例尺地图，图面力求清晰，从而为之后的踏查工作提供更好地工作基础。

（二）调查中的方法

在调查之中，首先应该仔细研究地图，对所调查区域的地形、地面状况进行全面了解，从而制定出调查的具体路径。通常情况下会有一个粗略的长期规划，并根据该区域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在每日踏查工作的前一天制定好该日具体的调查范围与调查路径。

以匹茨堡大学的调查方式为例，^[11]在进行踏查的时候，通常以3~7人为一队，队员以30~50米为间隔，呈一字型排开，沿着预先设计好的调查线路进行地毯式搜索，并以50×50米为一个预定调查采集区，每人行走路线为调查区南北向或东西向中线，在采集区内发现2片以上，20片以下陶片既作为采集点，而在视野所及范围内能够发现约20片以上陶片，则作为系统采集点。采集点都需记住坐标，并标注在地图上。如有遗迹现象，也应予以标注，并做相关记载。每天的踏查工作结束后，要将地图上的采集点进行数字化处理，标注到电脑中的地图上，并对采集点进行登记，记录其相关信息。这样，在调查结束后，便会得到一份关于该区域遗址分布的数字地图，同时遗址的具体信息也得到了系统性记载。根据这些信息，可以对采集点进行分期，从而确定不同时期内的采集点分布状态。同时还可以通过这些采集点判断遗址的大小、规模，为之后的社会组织形态研究提供依据。此外，如若采用数字地形图，那么还可以得到图中采集点分布

与具体的地形、地貌之间的关联，从而为分析人地关系，资源利用等问题提供基本信息。

（三）调查后的研究工作

从区域系统调查获取的关于遗址的基本信息，对社会组织形态演变，人地环境的重大课题进行深入研究，需要有一个对信息进行处理，解读的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便是依托于区域系统调查进行古代社会研究范式的关键之处。而这个解读环节，又涉及到众多理论的渗透，因此较为复杂，也有相当的争议。简要来说，研究社会组织形态，需要对聚落的等级、规模、不同聚落的差别、分布、密度等信息进行提取。在西方考古学界，较为盛行以聚落等级差别的视角来研究等级分化，社会复杂化进程，政治权利运转等诸多问题。^[12]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常通过所掌握的调查信息，根据遗址大小，遗存种类等信息对每个遗址进行聚落等级的判定，将不同等级的聚落分别标注，落在地图之上。并可以进一步做出等级规模曲线，为探讨社会分层、政治组织凝聚力等问题提供定量化的统计材料。

另外，依据人类学的理论，人口数量对研究社会发展状况，社会变迁等诸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13]例如，人口的繁盛，可以作为一个地区特定时代社会发展高峰的标志，而人口压力理论，也常常是解释社会复杂化发展动力、人类生计形态及对资源利用方式变化等众多问题的突破口。因此，通过区域系统调查方法复原不同时期调查区域内的人口规模也成为重要的研究手段。根据遗存多寡状况，结合一系列数理推导公式，一部分考古学家利用调查资料推断出人口的分布与规模，并利用GIS软件做出人口等高线分布图，以便在涉及到人口的研究中能够更为直观地进行分析。^[14]

除了研究遗址本身的信息之外，遗址之间的空间距离分析也能够为探讨社会组织形态等问题提供重要线索。滕铭予在对赤峰半支箭河流域调查进行分析研究时，利用不同的加权距离值，对不同时期遗址进行分群。从而探讨了从兴隆洼至夏家店下层时期社会组织形态的变化，揭示出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该区域内出现了具有凝聚力的较大范围的地域中心，其社会组织的等级结构较红山时期已经有了明显的发展。^[15]

此外,通过将遗址点利用 GIS 叠加在地形图、资源分布利用图等特性的地图之上进行对照研究,并统计与比较不同地理地貌单元内的遗址数量及分布格局,还可为探讨人地环境关系提供信息,从而进一步为阐释人类生业方式转变、文化兴衰等问题的原因提供线索。例如,吉迪将赤峰地区调查的遗址信息资料,落在赤峰市土地资源利用地图之上,并统计了不同资源类型土地上的遗址数量,结合对遗址的分期,做出了夏家店下层时期、夏家店上层时期不同土地使用类型的土地使用参数图表,并将之与现代村落土地使用参数进行对应,证实了夏家店下层时期的密集型农业生计方式的存在,以及夏家店上层文化依然以农业为主,但存在一定程度的畜牧经济的论断。^[16]

总而言之,在对调查信息进行处理、解读时,常常会结合从人类学中借鉴而形成的理论,利用统计学的手段,对遗址进行类别分类,空间分析,得出各种类型的遗址分布图与统计图表,从而为更深层次地探索社会变迁、人地环境变化等诸多问题提供分析数据与推理的依据。

(四) 区域系统调查方法与其他方法的结合应用

在宏观视角下的聚落考古研究中,区域系统调查无疑具有显著的优势,主要体现为:1.在广域内考察人地环境关系;2.大尺度地把握聚落结构的历时性变化;3.分析不同时期人类对于特定区域内的活动强度。

然而区域系统调查也有自身的局限性。由于区域系统调查仅仅采集暴露于地表的遗物,记录暴露于地面的遗迹,而很多反映遗址功能、性质的信息可能依然埋于地下,因此,仅仅依靠地表采集的系统调查,在分析遗址范围的功能分区,推断遗址性质方面就显得力不从心。而这样的局限性,则大大制约了仅以区域系统调查方法为基础的研究对社会组织结构、经济活动、社会分化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可靠性。在此情况下,西方考古学家往往将区域系统调查与其他研究方式结合运用,进行宏观时间下的聚落考古分析。例如,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周南教授采用“三段式”的研究套路,对于中南美洲、中国赤峰地区进行

了系统化研究。这种“三段式”套路的运用表现为:首先对选定区域进行区域系统调查。在系统调查的成果上,对部分采集遗物较多,面积较大的重点区域进行 household archaeology 的发掘方式,具体操作方式为在遗址区域内揭除 20 厘米的表土,过筛,将其中的遗存筛选出来,并分类记录。这样的方法为分析遗址内的功能、活动分区提供了线索。有助于判断遗址性质,为我们分析区域内的社会分化、经济活动、政治组织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更多的材料。而在 household 发掘方式之后,再选择其中遗存密集的地方进行小范围的试掘,确定地层,叠压关系,寻找测年样本。这样的“三段式”方法论有助于弥补区域系统调查的局限性,为探索社会变迁等聚落考古学问题提供更为客观、全面的资料。

四 对区域系统调查方法的批判与反思

(一) 区域系统调查的局限性及其弥补方案

虽然区域系统调查方法在聚落考古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效,然而其方法的可靠性却一直受到质疑。简要归纳一下,大概质疑的内容可以分为如下几点:1.不可能穷尽一个调查区域内的所有土地;2.调查区内不同区域地质、地貌环境差异大,会导致遗址被发现的概率出现差别;3.一部分采集的陶片难以辨别其年代与文化归属;4.对于遗址的认定存在质疑;5.陶片出土的位置有可能受到次生扰动;6.对于人口规模的推算存在较大争议。这些质疑,一方面指出区域系统调查在搜集信息方面会存在很大误差,另一方面则从根本上对区域系统调查的系统性、全面性提出了质疑。

诚然,任何考古学研究方法都不是完美的,都有其固有的严重缺陷。那么,如何来看待这些批判意见呢。首先,应该承认,区域系统调查本质上仍属于抽样性质的发掘,不可能完全充分地提取遗存信息,疏漏在所难免。但如若贯彻执行调查方式始终如一的标准,则仍具有系统研究的意义。此外,系统调查区具有较大空间,所以能够容忍一定程度的误差。例如,一个村庄所在之处,我们是无法做调查的。因此很可能此处有古人留下的遗存就无法发现。然而如果调查区域的范围足够大,在面积上远远大于这个村庄的覆盖



面积,那么在统计学的原理上,受村庄影响而可能造成的一个误差点,对于我们得出的更大范围内聚落分布的总体格局并没有大的影响。此外,地质、地貌环境造成的发现几率差异确实会对调查的可靠性产生影响。因此,应当结合地理知识,对这种差异的可能性进行评估,如果差异性能够在误差许可的范围内,则调查仍然可行。另外,对于是否存在遗存受人工、自然环境扰动的问题,应对遗址形成过程进行综合分析,将受严重扰动的遗存要在记录、统计、分析时区分对待。

总之,用区域系统调查的方法去研究上文所提及的考古学问题都是有误差的。所以,能够有效掌握区域系统调查的方法的一个关键就在于对各种可能性的误差进行分析,并将误差控制在不影响研究结论的范围内。同时,需要清楚的一点是,不同的研究问题,对误差的敏感率与容忍性有所差异,所以区域系统调查的方法在解决各层级问题上的可靠率是有差别的。对人地环境、聚落分布,人类活动强弱等问题,可靠率较高。对于社会组织、经济活动等问题的探讨可靠率次之。而对于人口复原的研究,则推理链条过长,可靠率的保证需要付出更为严谨的努力。

另外,对区域系统调查资料进行分析、解读的研究过程,也有不少批判的声音。关于遗址等级的划定,运用等级差异以及遗址间空间距离去解释社会组织结构,探讨政治控制与权力互动等问题,本身就是基于一系列结合人类学与考古学推断的假设前提之上。如若这些假设遭到否定,那么即使区域系统调查的工作开展得再扎实可靠,得出的结论也将会是饱受争议的。例如,聚落等级的差别,是否能反映出高等级的聚落一定对低等级的聚落有着政治控制权力,在考古学内部也并未达成共识。如果否定聚落大小差别反映出高等级聚落的社会控制力,那么基于区域系统调查资料的分析与解释所做出的结论,就很值得怀疑的了。因此,在反思区域系统调查的问题上,不但要关注它具体操作方式上存在的问题,也应该从更高的理论层面上去进行思辨,从而更加深入的探讨基于区域系统调查资料所得出的分析、统计结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说明聚落考古学所研究的问题。

(二) 关于区域系统调查的中国“本土化”现象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张光直在中国的讲学,使得中国考古学界对聚落考古等理论有了初步认识,而在聚落考古指导下的区域系统调查方法也受到了中国考古学界的重视。北京大学在甘肃葫芦河流域、湖北石家河遗址附近区域,以及湖南省所在澧阳平原地区,都借鉴了区域系统调查方法进行了调查工作。^[17]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美考古合作的开始,山东大学、吉林大学、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开始与国外高校,考古相关机构进行合作,将区域系统调查的整套操作方式引入中国,并依据调查材料,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18]在引进、学习区域系统调查的方法的同时,也将其与国内成熟的各种调查手段相结合。

不同于西方主要运用地表采集的方法,中国考古学家开展的很多考古调查都充分运用了钻探、断面观察、遗迹清理等常规方法,在调查中还利用丰富的文献与调查结果相验证。^[19]可以发现中、西方考古工作者在区域系统调查的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思维差异,主要表现在中国考古工作者更具灵活性、更注重搜集材料的全面性,重点突出。而西方考古工作者更强调在调查中贯彻执行统一的既定标准。无疑,中国化特征的区域系统调查,有助于考古工作者在最短时间内更为充分、全面地提取考古信息。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偏离了抽样、概率、统计研究的定量研究原则。为避免这样的弊端,我们可以将剖面观察、钻探结果与平面上采集的遗存区分记录,并避免在后期数据处理中将两类记录相混淆。同时,在保持适度灵活性的范围内,坚持统一的方法标准。唯有如此,才能在保证定量研究的原则下,更加充分地获取遗存信息。

此外,区域系统调查在中国实践操作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难度,即中原等一些地区的文化地层堆积往往较为复杂,叠压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堆积。然而这些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并不一定能够全部暴露于地表,这就给考古工作者判断遗址的年代,进行分期造成了困难。针对这一问题,目前尚未有成熟的解决办法,仍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在进行区域系统调查时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或许配合一定程度的试掘工作,可以弥补区域系统调查法面临这一问题时的困境,从而减少判断、识别遗址年代方面产生的误差。

五 总结

本文从厘清区域系统调查的定义入手,通过对区域系统调查兴起缘由的分析,区域系统调查的研究意义、区域系统调查在实践中的操作与运用、区域系统调查与其他方法论的结合以及对区域系统调查的批判、反思,阐明了区域系统调查服务于聚落考古的宏观层面研究,并可以与其他研究方式相组合,相辅相成,能够利用最小化的人力、物力、时间的投入,为在长时间、大尺度范围内探索社会复杂化进程、人地关系、文化交流、社会兴衰等古代社会变迁的诸多问题提供重要帮助。然而,区域系统调查方法其本身、其操作过程以及在对其材料进行加工提炼从而进行解释的过程中,都存在有很多缺陷,因此也常常受到质疑。面对质疑,首先应该承认区域系统调查的方法在解决不同层面的研究问题时,其可靠程度是有差别的。另外,在误差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考古工作者应该思考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误差率,而非对于误差避之不谈。

区域考古调查方法的核心在于系统化、量化,因此坚持一定的标准化执行规范,对于维持区域系统调查的有效性至关重要。所以在中国的区域系统调查实践中,需要对这种量化研究思维有所了解,尽量保持标准化的操作。对于一些可通过更灵活的手段获取的调查信息,应该与标准化方式采集到的遗物进行区别记录。此外,对调查成果进行信息分析、提炼的研究过程中,应该具有更加敏锐的问题意识与理论修养,这样才能更为充分地利用区域系统调查所获取的信息,去探讨古代社会。总而言之,虽然区域系统调查存在缺陷,但鉴于其在推动聚落考古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不应对其弃之不用,而应结合实践,运用各种方法去降低其误差率,弥补其局限,并结合中国考古学实践,探索出更加适合的区域系统调查方式。从而使区域系统调查方法得以不断改良与完善,为考古学研究提供更为可靠的服务。

注释:

- [1] 朔知:《中国区域系统调查方法辨析》,《中原文物》2010年第4期。
- [2] Colin Renfrew, Paul Bahn, *Archaeology: The Key Concepts*, Routledge 2 Park Square,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OX 14 4RN, 2005, pp186-188.
- [3] [加] 布鲁斯·崔格尔著,徐坚译:《考古学思想史》,第206~244页,岳麓书社,2008年。
- [4]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第74~93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 [5] [加] 布鲁斯·崔格尔著,徐坚译:《考古学思想史》,第206~244页。
- [6] [美] 罗伯特·沙雷尔、温迪·阿什莫尔著,余西云等译:《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第177~1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 [7] Ammerman, A.J., *Surveys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0, 1981, pp63-88.
- [8] 方辉:《对区域系统调查法的几点认识与思考》,《考古》2002年第5期。
- [9]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大凌河上游流域考古调查简报》,《考古》2010年第5期。
- [10] 系笔者与丁山博士交流所得。
- [11] 笔者曾于2012年参与过匹兹堡大学与吉林大学的辽宁西部地区的区域考古调查项目,文中所述方法既笔者在调查工作中所遵循的方法。
- [12] [美] 罗伯特·沙雷尔、温迪·阿什莫尔著,余西云等译:《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第386~392页。
- [13] [美] 马文·哈里斯著,黄晴译:《文化的起源》,第5~20页,华夏出版社,1988年。
- [14] [美] 周南、柯睿思:《早期酋长制群体的聚落形态比较研究——以内蒙古东部、安第斯山北部和美洲中部三个地区为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5期。
- [15] 滕铭予:《半支箭河中游先秦地区遗址分布的空间考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4期。
- [16] [以色列] 吉迪著,余静译:《中国北方边境地区的史前社会》,第61~7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 [17] 同[1]。
- [18] a.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b.方辉等:《鲁东南沿海地区聚落形态变迁与社会复杂化研究》,《东方考古》第4集,第253~287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 [19] 同[1]。